

档案馆

大象之用于战争，始自殷商时期，至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。尽管广汉三星堆出土了大量象牙，但目前尚无法断定其为战争留下的遗物。历史文献资料显示，巴蜀地区罕见的象战奇观，出现在我国古代象兵制度日趋成熟的明清时期。明清时期巴蜀战场上的象兵，无一例外均来自邻境云南。

## 明清时期巴蜀象战奇观

□陈世松

象载甲士 列阵成都城外

明朝洪武四年(1371年)正月，明太祖朱元璋鉴于全国统一大局已定，明昇大夏政权犹据蜀阻声教，决定大举伐蜀，命大将汤和、廖永忠率舟师由瞿塘趋重庆，傅友德率步骑由秦、陇趋成都。

同年七月，廖永忠自夔州抵重庆，夏后主明昇母子诣军门降。而傅友德所率的骑兵，却被夏丞相戴寿阻于成都城外。

据《明实录》记载，镇守成都的大夏军，出城拒战，“以象载甲士，列于阵前”。傅友德命前锋“以弓矢、火箭冲之，象中矢却走，寿兵蹒藉，死者甚众”，傅友德“亦中流失”。

出现在成都阵前的象军来自何方，史籍没有明文交代，仅从旁证资料推断，这些象兵肯定与大夏远征云南的历史机缘有关。

7年前，即大夏天统二年(1364年)二月，明玉珍在重庆称帝后，即遣部将万胜统三路大军远征云南。万胜率中军，由永宁路深入云南，一路上得到了乌撒、乌隆等部族的配合支持。

黄标《平夏录》明载，万胜在取得入滇首胜后，即遣侍中杨源向明玉珍呈表以闻，称其“获其象以献”。大夏兵从云南败归四川时，带回了产自云南的各种战利品，其中包括大象和良马。万胜将大象连同御象的少数民族士卒一同带回四川，组建起一支属于大夏的象军，完全是顺理成章的事。

在明军灭夏的关键时刻，镇守西蜀地区的主将戴寿，将这支象军部署在成都城外，用于抵御攻城。居于象背之上的夏军士兵，列于阵前，执兵射箭，致使傅友德身中流失。而大象也在明军弓矢、火箭的猛烈攻击下，中矢退却，最终伤及本方无数士兵。

恰逢此时，汤和遣人报重庆之捷，戴寿等亦得其家书，知重庆已降，遂无斗志，乃籍府库仓廩投降。傅友德按兵自成都东门入，得士马三万。八月，全蜀告平。



三星堆遗址三号“祭祀坑”内发现的象牙。据新华社

驱象突袭 人马惨遭辟易

有明一代，四川地区战乱不断，因与云南无涉，故罕有象兵战事发生。及至明朝灭亡，清军入关，张献忠死后，部将孙可望率领大西军残部由蜀出黔，入据云南，坚持联明抗清策略，奉立永历朝廷，成为独撑南明政权的军事支柱。

在这以后，大西军将士通过向西南少数民族学习，终于练成了一种拿手战术——象战，并将其带到我国南方和西南地区。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，巴蜀地区才开始出现利用象兵攻城拔寨的局面。

顺治八年(1651年)，永历帝新立，孙可望就封为秦王，兵势大振，大有图蜀之志。他命抚南将军刘文秀率兵入川，川中诸将无不听令，惟残明部将袁韬、武大定拒不从命。袁韬系张献忠旧将、摇黄十三家余党；武大定原隶明总督孙传庭部下，后降李自成，入蜀后归于总制李乾德部下。

李、袁、武三人嫉恨川南明将杨展，设计将其谋杀于酒席之上，并趁机夺占嘉定，取而代之，据有川南州县。刘文秀打着为杨展讼冤的旗号，发兵讨之。袁、武之兵六战六胜，颇轻敌，遂不设备。俄而，刘文秀由云南领象队突至，袁、武大败被擒。

沈荀蔚《蜀难叙略》记述此役过程甚详，称是年八月，刘文秀自建昌引兵入川，武大定遣将率众拒之，两军相遇于荣经，相持十余日。武兵“日选精骑挑战，文秀坚壁自守。一旦，填壕拔栅而出，战于小坪山。良久，文秀驱象蹂之，武兵乍见大兽，人马皆辟易……其得免者十之二三。”至此，川南、川西地区遂为南明政权孙可望军所据。

象吼马惊 洞开叙府城门

顺治九年(1652年)三月，清军大至，入据成都。

时刘文秀已返贵州，留部将白文选守嘉定。吴三桂率清军由成都下嘉定，遣总兵蓝一魁领兵取叙府，守之。八月，刘文秀由黔入蜀，自永宁移营至叙府郊外，蓝一魁遁入城中。

《蜀难叙略》记述象军坐开城门的见闻称：“须臾，文秀拥诸攻具登城，被杀者山积于城下，犹不能克。后城门为象所坏，文秀遂得入。”

叙府城陷，吴三桂闻之，自嘉定提兵往救。刘文秀同部将王复臣出象队进行拦截。

李馥荣《艳灞囊》记载象战场面惊心动魄，称王复臣“以象冲其马前，步兵夹于左右，冲入队中，象吼马惊，兵心弗固，三桂败走川北”。



冷兵器时代战象可谓所向披靡。本报资料图片

保宁之役 清军大破象阵

顺治九年十月，刘文秀出兵攻保宁，吴三桂出城拒之。

当时，刘文秀“横列十万众，势炽甚”。刘文秀列阵于城东北较场，以象十三头领十三营，列阵九重，象居前，坚不可犯。

据查继佐《罪惟录》记载，在南明永历诸军中，晋王李定国素以“善用象”著称，他即以“象十三”命名，所向必碎。刘文秀在此役中，即采用了“象十三头领十三营”这种最高规格的阵容战法，可谓倾尽了全力。

刘文秀在保宁屡败清兵，颇轻敌，不待白文选兵至，谋急攻。王复臣力劝“毋围城”，刘文秀皆不纳。

孙麒《蜀破镜》记述保宁之役中象阵与步骑决战的场面称，清四川巡抚李国英督军“捣其中坚，破贼象阵，别遣锐师出间道摩垒疾击，歼贼数万，挤死于城下大江者无算”。

王复臣战死，刘文秀大败，遁走时为嘉陵江所阻，遂致全军皆没，但见“长发浮尸”蔽江而下。惟刘文秀与张黑神等数百人，依赖“浮象而免”。吴三桂不敢追，曰：“生平未见如此劲敌，特欠一着耳。”

象死山谷 遗物难以尽举

顺治十三年(1656年)秋，刘文秀与李定国同奉桂王入云南，受封为蜀王，再次引兵略川南，在洪雅西南之花溪，大兴土木，建造行宫天生城。是时，川南、川西一带仍为永历政权所守。

第二年(1657年)二月，李定国促刘文秀归云南，刘文秀旋病死，由其带入四川的象军，为部将高承恩所承袭。高承恩原本是雅州义士郝孟旋的义子，自郝孟旋举兵抗拒张献忠以来，该部即成为镇守雅州、控制川南川西的军事力量。郝孟旋死后，高承恩以咸宁侯守雅州，更恃其强，蜀中无敢与抗者。

顺治十六年(1659年)七月，郝孟旋之子郝承裔，因不满高承恩独统兵权，谋杀高承恩自署为将军，恐众不服，不得已降于清军吴三桂。

顺治十七年(1660年)八月，郝承裔降清复叛。既举事，即带领象兵从雅州驰攻嘉定。刚由保宁收复成都的清军，在洪雅与郝承裔交战，不利。十一月，郝承裔又在邛州以象队冲击清军步骑，清军溃围得出者只有“十之二三”。

顺治十八年(1661年)正月，清四川总督李国英自川东来援，率兵屯于洪雅，与郝承裔军相对峙。郝承裔凭借竹箐关及对岸之险为固，设关门，各以数十人守之。清军乘夜发兵，突破叛军防线，郝承裔南走荣经县。

四月一日，两军相遇于八步石，道路险仄，不利驰驱，乃俱舍马步斗。经过激烈鏖战，郝承裔军饥渴不支。恰逢此时，“其象反走，自践其众”，郝承裔大溃散走。清军乘胜追击，余众悉降，川南告平。

《蜀难叙略》记载善后事宜云：“象寻死，中有炮子、矢鏃二三斗，皮骨齿牙百余人举之不能尽，旋获承裔于黎州山谷间。”

经过这次战役，在清军火药炮子、投枪弓箭等冷热兵器的攻击下，留在四川的兵象就歼于荣经八步石。用于杀戮大象的炮子、矢鏃有“二三斗”之多，外加大象的“皮骨齿牙”等遗物，重量惊人，百余人不能尽举，战事之惨烈由此可见一斑。

纵观清初顺治八年(1651年)至顺治十八年(1661年)的10年间战事，由刘文秀从云南带入四川的象军，足迹遍及嘉定(今乐山市)、荣经(今雅安市荣经县)、叙府(今宜宾市)、保宁府(今南充市阆中市)、邛州(今成都市邛崃市)、洪雅(今眉山市洪雅县)等境，其所留下的象战场面，堪称巴蜀战争史上罕见的奇观。

此后，随着西方列强坚船利炮进入中国，象兵这一古老的兵种，便早于骑兵退出历史舞台。这样，明清时期巴蜀地区仅有的几次象战事件，遂成为响彻历史的绝唱。